

“授之以渔”式的维权,让农民工们渐渐学会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为人处事也渐渐有了法律意识……

维权“大舅哥”八九事

本报记者 刘建林

晚8点多,太原市尖草坪区汇丰小区一间租房内,8岁的东东(化名)放下了手中的作业,咬住铅笔头思索半天,煞有介事地说,“爸爸,我才不上你的当呢!”

正在做饭的父亲王四平有些漫不经心,“哦?我有什么事骗你了?”

“你说过,要是有人打我不要怕,让我用砖头糊他脸上,你有的是钱,对不对?”

“这就是骗我的!”

“这怎么骗你了?不是怕你吃亏吗?爸爸出钱摆平呀。”

“不对!赵伯伯说了,要是把人家打坏了,赔钱不说,我还得进派出所,本来你挣的钱可以全给我,这样一来不就没了?咱们家就完了!”

“说的也是,那可怎么办?”

几天以后,没上过几天学,32岁也还是个大孩子的王四平找到了“赵伯伯”赵东会,认真真接受了一次普法教育,从此心里有了些“谱谱”。

赵东会是山西省太原市尖草坪区总工会外来务工人员服务中心的兼职主任,几年来,他帮助并带领汇丰街道外来务工人员学会了合法维护自己的权益,建立了当地的良好秩序与和谐环境,被农民工们亲切地称为“大舅哥”。

三个“倒霉蛋”

酒后驾车撞伤了人,这对四川籍农民工冯九山来说是个“塌了天”的大事。

出门在外靠老乡。在老乡的帮助下,冯九山到处“打点”,一年多的积蓄外加8000元的借款全部打了水漂。可这也没有改变他的命运,该拘留,该赔偿的一样没少。事情办完,老

婆预产期也到了,可他再也拿不出钱来,也再没个借处。

情急之中,想起法院还押着3000元的押金,听人说这钱结案后可以退回来,可跑了十几趟就是要不出来。经老乡介绍,无奈的他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找到了赵东会。

赵东会领着冯九山找到了当事法官。可法官不给,老赵就说人家老婆要生孩子了实在没钱了,法官反问老赵是干啥的,老赵说是当事人的“大舅哥”。法官说3000元钱能干个啥?老赵说要真不给我可就找检察院了,检察院正好管这种事情。法官一看对方懂得其中的奥妙,只好把3000元钱退了。

事后,冯九山的老乡们都知道了他“大舅哥”的事,也开始有意识地了解公检法办事的规则,有事第一时间就来了,再不找“中间人”帮忙。

来自娄烦的老张在装饰市场开了间石材铺,每月税款都有税务代征员来收,老张觉得按时交了税就是合法经营了。可是有一天不知出了什么问题,税务代征员说要关张他的石材铺,这可把老张的命要了,全家惟一的经济来源就是这个铺子,何况还供养着一个正在上学的孩子。三番五次求饶也无法打动税务代征员,无奈之中老张找到了赵东会。

“每次交税有票吗?”

“没有。”

老赵到税务所一查,居然没有老张纳税的任何记录!

老赵悄悄给老张准备了录音笔,交代老张再找税务代征员交涉,交涉过程中要把老张一直按时交税的事情说清楚并且录好音,并反复叮嘱老张这是证据,没有证据他就等着白白吃亏吧。

证据拿到后,老赵很快就把事情办妥了。

老张也从中学到了奥妙,主动到税务所进行

了登记,像老张一样开着铺子做买卖的同行们都学着进行了登记,从此经营更加稳定。税务代征员再也挑不出毛病了。当然,涉事人员也受了处理。

五合人薛文平经营一家药店,每次进药都有人送药上门,经营也算顺手。突然有一天,一笔3000元的药品被药监局查扣,说发票是假的,药来路不正,不久后又一笔1300元的药品同样被查扣。薛文平几次到药监局协调也没有结果,扣了药品不说还罚款3000元,这一来二去的好几千元就没了,对于薛文平的小药店来说损失难以承受,找药监局也不理他的茬。找到老赵后,老赵帮助薛文平把证据收集齐,这才得到了合理解决。

一群被热心呵护的孩子

赵东会没有想到,本来是外来务工人员服务中心,可日常打交道的却是一群孩子。

大约七八年前刚刚开始帮助农民工时,找不到需要帮助的人,细心的老赵开始琢磨,从哪里入手呢?

忙于打工的农民工晚上往往不能按时回家,他们的孩子只能在家门外玩耍或写作业,或者去了网吧,看到这些,细心的老赵突然茅塞顿开,就从孩子们入手。

老赵协调了一个10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与北京四中网校建立了联系,一方面开通了网上辅导教学,同时聘请了山西科技大学的大学生志愿者辅导孩子们做作业,把附近下午放学后回不了家的孩子们统统请到了他的中心。

乐乐是个聪明活泼有点调皮的孩子,网络游戏玩得很有水平。一天老赵问乐乐,明天语文课讲什么呀,乐乐翻翻课本说长城运河。老赵又问,你见过长城运河吗?乐乐说没有见过。老赵于是从网上调出了长城运河,并给乐

乐作了介绍。第二天上课,经过网上预习的乐乐受到了老师的表扬。从此以后,乐乐的语文成绩突飞猛进,学习劲头迅速高涨,游戏却渐渐放到了一边。

像乐乐一样,许多孩子不仅得到了安全温馨的照顾,学习成绩也有了变化。他们的家长来接孩子时经常要交流交流,许多信息和难以解决的困难就及时传达到了老赵的耳中,老赵帮助他们维权的故事就一出出一地开始了。

在这个中心服务的志愿者们,换了一茬又一茬,期间还曾吸引来一位美国外教,当然也着实吸引住了孩子们。中心也从当初的100多平方米扩展到了400多平方米,直至建设了临时宿舍,谁家的家长晚上回不了家,孩子在中心一样吃得饱睡得好,为外来务工人员解决了后顾之忧。

一个来之不易的小环境

随着赵东会帮助农民工维权案例的增多,农民工们自己也渐渐学会了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时为人处事也渐渐有了法律意识,素质逐步提高。

与此同时,这个中心及赵东会还积极协调各种资源,尽可能为困难农民工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2008年7月,住在兴华东社区的外来务工人员徐亮,其子徐子栋考上了南开大学,但爱人无工作且有病,孩子无钱入学。有老干部得知这一情况,主动捐出6000元,使徐子栋顺利地上了大学。

外来务工人员陈飞飞,爱人大病刚出院,又发现其女双耳听不到,需配置助听器 and 做耳蜗手术。服务中心得知这一情况,及时向总工会汇报,总工会及时救助1500元,省检察

院主动资助1万元,司法所主动联系残联给予康复培训和治疗。

河南籍的外来务工人员魏刚,因交通事故造成骨折先后垫付医药费3万余元,但肇事车主(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负全部责任)就是不赔偿,叫魏刚通过诉讼解决。魏刚垫付的医药费大部分是借老乡的,因此无线通过诉讼解决;本人租住地下室潮湿,对身体康复不利,想回家又不能回。服务中心主动和汇丰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联系,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和调解员及时和保险公司沟通,取得保险公司的同情,并和保险公司一起做肇事车主的工作,经过多次调解魏刚与保险公司和肇事车主达成了赔偿协议,魏刚及时拿到了赔偿款,为魏刚节省了诉讼费用。

2013年12月外来务工人员陈巍巍等3人向服务中心反映某公司拖欠他们工资近6万元,多次讨要未果。服务中心及时联系汇丰司法所、汇丰法庭、尖草坪区检察院民行科开展联动调解,四家共同形成讨薪联动机制,先后两次找某公司做工作,四家从不同的层面为其法人讲拖欠工资造成的不利后果,终于使某公司法人认识到拖欠工资带来的法律后果,主动支付了欠薪。

在外来务工人员服务中心的努力下,汇丰街道近年来逐渐形成了良好的服务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环境,使得这个地处城乡接合部、外来人口比本地人口还要多的地方更具城市的影响力。

担任着尖草坪区司法局汇丰司法所所长的赵东会,在中心的工作从下班后开始,一直要到晚上十一二点才能回家,常年如此,尽管经年劳累,他却感觉无比快乐,他说他在做一件积德行善的事情,不仅自己享受到了助人的快乐,也深深教育了自己的孩子,儿子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他很欣慰。

农家新时尚：“冬闲”变“冬忙”

入冬以来,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农民纷纷投入到温棚建设、蔬菜冬种、农产品加工等生产中。“冬闲”变“冬忙”,已悄然成为当地农民的新时尚。

下图:11月17日,内黄县七里井村农民王东娥在制作手工挂面。

下图:11月17日,内黄县张家粉坊的工人在生产手工粉皮。

新华社发(刘肖坤 摄)



一群“新市民”的“文化自觉”

本报记者 陈华
本报实习生 谢晓侠

11月8日,2.5万余名排舞爱好者在杭州共同创下了一个新的最大规模同跳排舞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参加这次排舞活动的人有不少来自专业舞蹈队伍、警察、少数民族、空姐以及国际友人。其中,一支来自合肥的由13名“大妈”组成的“超越舞蹈团”在这群阵容豪华的排舞队伍中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这支大妈级的业余舞蹈队员全部是来自合肥城郊地道地道的农民,她们同时又是由于失去土地而正在逐渐融入城市生活的新市民,在为融入城市生活积极谋生的同时,大妈们带着草根的文化情结,展现出了令不少城里人也自叹弗如的“文化自觉”。

刚离开农田的大妈迷上了舞蹈

3年前,新建的合肥滨湖新区开始了一轮回迁,一群刚从泥巴地里走出来的农民一转眼成了城市里的新市民。

住上了高层住宅小区,生活方式也由过去的田间地头转向了城市街巷,然而快节奏的城市生活却让他们一时难以完全适应。住上了高楼是否意味着真的融入了城市的生活中心呢?不少人对此感到很迷惘。

由于有一个健康的社区文化氛围的朴素想法,同时也是出于对广场舞的热爱,小区居

民孔正年辞去了保险公司的工作,自费组建了一个“超越舞蹈团”。孔正年告诉记者,舞蹈队取名“超越”意为超越自身,从生活方式、身体素质、心理上做到超越,使她们在收获快乐的同时,也收获着健康。

通过区、街道搭建文化平台,“超越舞蹈团”开展文艺培训和辅导,不断地摸索排练,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并组织了一支近百人的广场舞舞蹈队。

一个偶然的机会,孔正年得知了中国排舞推广中心将于杭州举办的“万人同跳一支舞,共创排舞吉尼斯纪录”活动的消息。孔正年把这个消息告诉她的姐妹们后,所有人都热血沸腾起来,期待着能够参加这样的盛会。

随即,孔正年和她的“超越舞蹈团”开始了一次冲刺吉尼斯纪录之旅。为了这次挑战赛,她们足足训练了218天。经过长达半年时间总共十几轮的选拔后,孔正年带领姐妹们在数百支舞蹈队中脱颖而出,顺利取得全国“入场券”。11月8日,孔正年和她的“超越舞蹈团”最终成功完成挑战。

大妈们的文化自觉

11月10日,捧着由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中国排舞中心颁发的挑战证书回到合肥,孔正年和她的“超越舞蹈团”立马成了社区的“明星”。街坊邻居们自然都没有想到,这些3年前还是只会唱庐剧“小倒戏”、

做农活的地道农民大妈竟然能走上“国际大舞台”。

“我们团队今年已经在合肥市各大广场演出中获得了4个一等奖呢!”冲刺吉尼斯纪录成功的孔正年一脸的喜悦。

舞蹈团组建前期,团员们大多是刚刚抛掉农具,换上新装。“那时我们都没有舞蹈基础,连最基本的动作都做不了,孔团长就下载视频给我们看,从零学起。”团员聂玉琴说,没有舞蹈服,她们就自己做;没有化妆品,就从家里拿女儿、儿媳的。有时为了一次大妆,她们需要从凌晨4点开始,装扮8个小时。

文化活动带来的好处非常明显。聂玉琴、朱业芝等一些队员的身体不好,年纪轻轻就患上了糖尿病,走路也歪歪倒倒,被大家笑称是“丝瓜瓤”。孔团长成立“超越舞蹈团”时,亲自上门邀请她们参加舞蹈队。3年的广场舞跳下来,她们现在已经成了身体健康、精神矍铄的舞者。

要把文化之花插进社区土壤

“很多人都以为我们只会跳广场舞,其实我们做的远不止这些。”孔正年喜欢在别人面前这样“辩解”。

而无论是在义城街道,还是在滨湖康园社区,孔正华给人的印象都是一个文化志愿者。在社区举办的首届“楼栋好人”评选活动上,孔正年把她自编自导自演的小品《说

唱文明人》搬上了舞台,原汁原味的合肥土话,用快板的形式说唱出来,引发台下观众哈哈大笑。

住在回迁小区里,很多“新市民”一下子不能适应高楼生活。高空抛物、随处扔垃圾、乱撒乱倒生活污水等行为屡禁不绝,公共设施也多次被孩子们玩耍破坏。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孔正年说:“这里居住的大多是土生土长的农民、农民工,把文化与轻松娱乐的小品结合在一起,用他们熟悉的语言讲出来,能帮助他们更好地接受、消化。”

广场舞大妈的行为也经常受到一些非议,孔正年为此特意定了一条规矩,要求团员每天上午只能在社区舞蹈室排练,而到了晚上,她则要求20点50分之前关闭音乐退出舞台。每当遇到学校考试等一些需要“禁噪”的特殊时期,她则要求暂停一切室外舞蹈活动,即便在舞蹈室里也要把音乐调到最低。

在社区内,她们更是主动承担文艺志愿者的职责,自编自演节目弘扬文明新风尚,对不文明行为,用丰富多样的文艺演出节目加以劝阻、引导。“居民亲昵地称她们为‘社区好大姐’、‘文明百事管’。”滨湖康园社区书记钟林说。

据《法制晚报》11月17日报道,记者在通州区尹各庄发现了一藏身于库房之中的赌博机窝点。据了解,附近的不少外来打工者都迷上了赌博机。一名网家称,“我100元钱能玩多久?1秒钟就没了!”

【点评】打工者自己在外,缺少家人约束,再加上打工生活枯燥无味,当受到他人的引诱时,很可能参与赌博。一些人在打工者聚居地开设赌博机窝点,正是看准了这一点。从一位网家的表述来看,在接触到这一游戏之初也曾赢钱,但随着下注加大,都已经输进去两万多多元了,但是“自己根本就控制不住”。有些事情,比如吸毒、赌博是根本不能尝试的,因为一旦有第一次,就可能禁不住诱惑深陷其中。因此,打工者应自觉远离赌博,政府部门也应加大对赌博窝点的打击力度,对相关责任人采取必要的惩戒措施。

(点评 杨召奎)

陕西初步摸清尘肺病农民工底数

全省确诊及疑似患者 15023 人
生存困难问题突出

本报讯(记者毛浓曦)正在进行的陕西省尘肺病农民工问题专题调研,初步摸清了全省底数。截至2014年6月底,全省确诊期别的尘肺病农民工患者2858人,疑似患者12165人,共计15023人。这一数据大大低于此前有关部门的预计及民间专业救助组织的估算。

近年来,农民工尘肺病问题备受关注,但究竟有多少患者,没人能说清楚。据卫生部资料,到2010年底,全国累计报告尘肺病676541例,死亡149110例,而近年来尘肺病人正以每年两万多人的数量增加。但国家职业安全卫生研究所、中国安全生产科学院专家认为“至少100万”、“160万都不止”。而全国唯一专门救助尘肺病农民工的民间组织“大爱清尘”提出的数据是“600万”。

陕西此次专项调研源于陕西省总工会借助与省政府的联席会提出的建议。此前,陕西工会在帮扶困难农民工的过程中,注意到尘肺病对农民工生命和健康的严重威胁,于是展开点上调研。2013年12月20日,陕西省政府与省总工会第24次联席会议召开,陕西省总提出《关于开展尘肺病农民工情况调研和进一步研究制定相关救助政策的建议》。建议当时推算的数据是“2.36万人”。

该建议受到陕西省政府高度重视。2014年上半年,陕西省人社厅、民政厅、财政厅、卫计委、安监局、省总工会联合,在全省范围展开专项调研,其中省级调研组深入汉中、安康、商洛三市重点调研。

据对调研数据的分析,全省尘肺病农民工主要集中在贫困山区,安康、汉中、商洛三市占84.9%;从年龄看,86%的患者在31岁到60岁之间;绝大部分患者已离开工企业返回乡里,但仍有1984人继续务工;从治疗情况看,住院治疗3588人,非住院治疗7258人,未治疗4177人。

调查显示,尘肺病农民工群体生存存在“比较突出的困难和问题”,表现在:家庭收入急剧减少,生活普遍困难,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现象普遍,部分人出现厌世情绪,叹言“被尘肺病判了死刑”、“对不起子女”;住院治疗人数少,并且治疗简单,主要以减轻症状、延缓病情、治疗并发症为主;治疗费用昂贵,报销比例较低,个人负担重,大多数患者放弃系统性治疗,而选择维持治疗,导致病情不断加重。

参与调研的陕西省总保障部部长徐运平说,“这次调研的数据应该还是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全省尘肺病农民工患者的基本状况,当然有些潜在的患者或一直在外未归的,可能有遗漏,但那种情况毕竟很少。”